



清华情缘

○曾昭堃（1960届土木）

现在，我虽然已年逾八旬，但是在清华度过的六年学习生活仍然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那是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我进入清华是很偶然的。我所就读的是广西容县中学，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学校获得两名留学苏联保送生指标，我是保送生对象之一。进行政审和体检后，完成了上报程序。但毕业前夕又通知我照常参加全国统考和填报志愿。班主任要求高材生要到最优秀的大学去，让我把自己随意填写的学校改成了清华大学。就这样，我成了容县有史以来第一个上清华的大学生。

难忘的校园生活

接到清华大学土建类的录取通知书，我这个19岁、从未到过大城市的热血青

年，怀揣着几十元路费离开了亲人和故乡。在北上的列车上，我结识了广西玉林高中考入清华的蒋友培同学。到北京的旅途要三天多，我第二天就病倒了，发高烧。车到武汉，过了轮渡，不得不下车休息治疗。多亏蒋友培同学陪伴照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我们第五天才到达北京。坐清华的接待车到了学校，如同到了家一样，感到无比温暖。

入校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分专业。我也像很多同学一样报了建筑专业，去参加了素描考试。考场设在第二教室，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在讲台的桌子上铺了白布，上面放置一个杯子，让大家画素描。我觉得太简单了，完成得很快，是第一个交试卷的。但是我却落选了。在张榜公布的专业分配名单里，我被分到了给排水专业。

宿舍安排在三号楼的四层，给01班和

我们给02班紧挨着。我被分配在最大的402房，住八个人：宋秦年、卞全、封国楷、曹昌初、褚元魁、吴铸钦、曾昭堃和房0班的张光宇。住了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变动过，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尊重，亲密无间。

开学不久的一



2010年4月25日，1960届给0班毕业50周年返校与老师合影。第一排左起：曾昭堃、徐本源、张汉昇、钱易、李国鼎、陈志义、余刚、丁宏达、井文涌、宋秦年

□ 我与清华

个周末，给9班和给0班在三院教室开了一个迎新联欢会，没有节目单，几乎都是互动性的即兴表演。给9班的女同学起哄叫刘鸿亮老师唱《拉兹之歌》，他的演唱声情并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5年的“十一”国庆节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庆祝活动。凌晨四点多钟起床，领了干粮就去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西直门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到东单指定的位置，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校旗，挥舞着小旗子，喊着“毛主席万岁”口号走过天安门，看见城楼上的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大家都很激动，喉咙都喊哑了。我们还参加了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狂欢活动。我们到广场时迟了一步，人实在太多，各单位已按规划范围用人墙围了圆圈。最后我们找到了清华的地盘，回归了队伍。当晚的活动内容是看焰火、文艺表演、跳集体舞，最后是跳谊舞，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返校。

给02班团支部是宋秦年任支部书记，团组织生活搞得丰富多彩，我们先后去了颐和园、八达岭长城。那时的八达岭车站虽然很小，但立有詹天佑铜像。行走在巍峨的长城城墙之上，极目莽莽原野，长城就像一条奔腾的巨龙，蜿蜒在群山之上，完全征服了我的心，激起了我们对祖国的无比骄傲。

在清华的前两年是学基础课，很多课程都是同年级的两个或三个专业一起。集中在大教室上大课，上完一堂课之后，又要走很远的路到另外一个教室去上课，而课间只有15分钟，搞得很紧张。我们房间的同学大多数都在宿舍晚自习，大家都很自觉，只要晚自习铃声一响，就停止其他活动，坐下来安静地温习功课和做作业，

下自习的铃声一响，大家立即收拾，抓紧时间洗漱，之后自觉熄灯上床，不再有人说话。清华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和生活秩序，至今仍引以为傲。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健身活动，开学没几天，全体1955年度新生到大礼堂听马约翰教授作报告。只见他一身西式装束，童颜白发，红光满面，声音洪亮，作报告时不要麦克风，嗓音提得很高。主持人曾两次递麦克风给他，都被他拒绝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其核心内容就是讲“运动”两个字。清华的课余体育活动是很活跃的，到了完全普及的程度，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可以说人人参加。

毕业前夕，给0全班同学又和三院教室聆听了马约翰教授的报告。这一次可以说是临别赠言，他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了出去工作以后的养生之道，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他讲了如何坚持体育锻炼，如何保持生活规律，如何保护眼睛，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提高睡眠效率等。讲到如何提高睡眠效率，他说睡前先把寝室窗户打开通风，冬天也要这样。洗漱时要用冷水洗眼睛，然后到室外呼吸一阵新鲜空气，凝神站立，眼望远山或天空。天气晴朗时，最好远眺某颗星星，停止一切思维和杂念，让大脑变成一片空白，这样不多久就会进入半睡眠状态。这时返回卧室，关好窗户上床就寝就可以了。在清华打下的体质基础和养成的锻炼习惯，成为我后来在工作岗位上能适应各种环境和繁重工作任务的重要因素。

当留学生的辅导员

给0班有两名留学生，都是朝鲜来的公派留学生，是给01班金致谦、给02班郑

相俊，郑相俊的辅导员就是我。

当时清华的留学生不多，主要是越南留学生，有几十人；其次是朝鲜和印尼，其他还有苏联、阿联酋、埃及等国。每个留学生都派一名同班的中国学生做辅导员，协助他们完成学习任务。在校长办公室领导下设立留学生工作组，有几个学生参与工作，我班夏鸿文同学便是其中之一。1956年上学期，夏鸿文同学找我谈话，叫我搬到留学生宿舍去住，当郑相俊的辅导员。留学生宿舍就在三号楼的第五层，每间房住一名留学生，室内配置床、写字台、椅子、书架各两套，分别供留学生和辅导员使用。辅导员和留学生只是住在一起，就餐则各到各的食堂。

留学生虽然在进清华前已预修过汉语，但是其听和讲的能力与中国学生毕竟存在差距，加之有个别老师的普通话不太标准，他们就更困难了。当年很多课程没有教科书，大多数是课程的教授自己编写讲义，而讲义往往是上完课很久才能发下来，全靠听课时当场消化和记笔记。每堂课的容量都很大，既要听懂又要记下来，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无疑是勉为其难了。作为辅导员，帮助留学生补些笔记，讲解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内容，讨论一些作业中的难题，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和郑相俊一起生活了四年左右，直到1959年我被抽调去工读班，才由冯德曾同学接管了我的角色。在和郑相俊相处的四年里，大家互相尊重，和谐融洽，亲密无间。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条体育锻炼穿的运动裤，是咖啡色的，他见了很喜欢，有意要和我交换，我就毫不犹豫地和他换了。郑相俊对我也是关怀备至，他假期回朝鲜探亲，回校时带了满皮箱的苹

果，还有烤熟的鱿鱼干、人参酒等食品。下了晚自习，我们一起喝酒，吃鱿鱼干、苹果，谈天说地，有时还叫其他朝鲜留学生一起来分享。有一次他从朝鲜回来，说家里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平壤医科大学的学生。他拿出照片给我看，是一个长相漂亮、充满青春活力的朝鲜姑娘，我对他表达了衷心的祝福。

郑相俊毕业回国前，为了表达送别之情，夏鸿文和我等人一起邀他游颐和园，并在颐和园的外宾餐厅为他饯行。我还送给郑相俊一把纸折扇，上面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的赠别诗。郑相俊知道我家境贫寒，他背着我先后三次给我家里寄过钱，每次都是十元、五元，在那个特定的困难年代，这些钱是很有用的。我是1961年毕业时回到家才知道他寄钱的事。

真刀真枪的教学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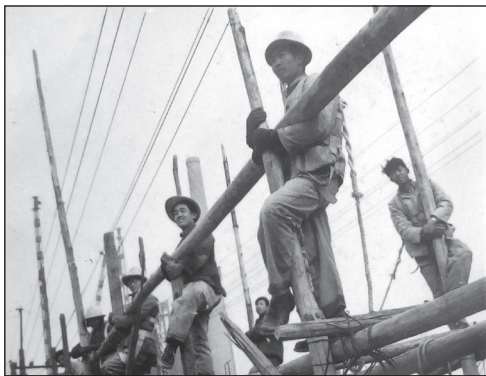
我们进入专业课程学习后，接连到天津市的芥园水厂、上海市的杨树浦水厂和长桥水厂，还到过污水处理厂进行参观见习。这时，我对自己学习的专业才开始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1958年，清华提出学生要真刀真枪搞设计，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以9字班、0字班学生为主力，首先是建筑系，参加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十大工程设计方案的全国竞选。接着，土木系跟进，轰轰烈烈地进行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国家科技馆、国家美术馆四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图设计，稍后又增加清华主楼工程项目的设计，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设计工作十分紧张，晚上加班是正常的，有时甚至是干通宵。我曾连续加班50多个小时，人已处于疲劳的极限状态，但是凭着一股毅

力，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

1958年夏，东长安街要从东单往东延伸到建国门外，给0班承担了这条路的地下给水管道工程施工任务，这是一条直径400毫米的铸铁管。我们的临时工棚设在前门一段城墙顶上，往返工地都是步行，上夜班深夜来回也是如此。同学们既当工人，又当管理人员。管沟的土方工程是人工开挖与机械开挖相结合，回填则以人工作业为主。土木系施工教研时，有一台教学用的链斗式连续挖沟机，听说当时是国内唯一一台，这样的施工机械也被派上了用场。我记得林仰驰同学曾经当过司机，有一次午休，一同学躺在链条上小憩，下午开机时差点出了事故。铸铁管油麻石棉水泥接口的人工打口作业、管沟回填土夯实的人工打夯作业，都是劳动强度很大的体力劳动，当时正是夏天，所以人人都是汗流浹背，但是大家有说有笑，愉快地完成了工作任务。

1958—1959年冬春之际，石景山钢铁厂新建二号高炉配套新建一个三号泵房，我们给0班又承担了该泵房的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同学们变成了起重工、架子工、



1958年冬参加石景山钢铁厂2号高炉扩建工程的劳动现场，前排右1为曾昭堃学长

瓦工、抹灰工、木工、模板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既当技工，也当小工。当时正是隆冬季节，但大家干起活儿来也是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是使出十二分的努力。有一次在混凝土搅拌台上料时，我看见女同学郑孔秀一人扛了一袋儿水泥，让我十分感动。

在总结这两项工程施工的基础上和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给0班同学分工合作，1959年编撰出版了《给水排水工程施工》一书，后来被作为高校教材使用。这段工程实践经历，不仅使我后来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时能更多地考虑施工因素，提高设计质量，而且为我在后来对工作的适应性和驾驭能力方面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1959年春夏之交，北京团市委在北京高校抽调人员组成百人工作队，支援河南省“大跃进”。清华是抽调人员最多的单位，给0班只抽调了我一个人。我参加了登封县钢铁厂的设计，边设计边施工，我还参加过开挖引水明渠的劳动。工作了大约三个月，没有建成就撤退了。在离开的前一天，县里安排大家参观游览了嵩山和少林寺，派人去村子里叫来几个和尚，给我们表演少林拳。

1959年底，土木系从各专业抽调50人组成工读班，作为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试验班。我是班委会成员之一。工读班名义上是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工作，具体工作任务是清华主楼工程和806工程（现200号）的设计。1960—1961年，郭旗煌、杨祖良、李仲三和我作为设计单位驻工地代表，在806工程工地住了好几个月。在工地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协助施工和监督工程质量。

同学情深

给0班同学在学习和工作中互相帮助，互相关照，使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庭般的温暖。从低年级开始，我就感受到夏鸿文同学对我的亲切关怀和百般爱护，我也把他视同哥哥一样亲近，感情是比较深的。在清华期间，只要我进城，我多半都会到他家串门儿。他原来的家在珠市口东大街，乘公交车前往也很方便。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奶奶，奶奶对我亲切热情，每次去都要留我吃晚饭才让走，并且饭前总是吩咐夏鸿文说，昭堃会喝酒，去打点酒回来。

1961年7月，毕业离校前夕，我祖母去世，家里来电报说等我回去送葬。于是，在未进行毕业分配的情况下，我匆匆离校返乡，夏鸿文、金文漪、杨祖良、郭旗煌等几位同学把我送到北京火车站。临别前，夏鸿文对我说，报毕业分配志愿时，我再通知你，使我能放心离校。后来我填报去部队的志愿，就是通过夏鸿文同学帮助办理的，这一切到现在我都心存感激。

给0班的同学比我们调到工读班的同学早半年即1961年初毕业离校。给0班的毕业照没有忘记我们工读班的同学，叫我们也参加合影留念。1961年元旦，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的特定历史时期，给0班筹办了一次丰盛的聚餐会，也邀请了工读班的同学参加，这些都让我深深感受到给0班集体温暖。

我毕业后到军委总后勤部的白城办事处，从事国防战略后方基地工程建设，出差机会比较多。只要有会，我都会去拜访老同学。1965年，我从部队第一次回广西老家探亲，还绕道到南宁市拜访了肖睿

书、吴铸钦两位同学，当时他们都在广西综合设计院工作。巧遇吴铸钦结婚，还应邀参加了他的家庭婚宴。1968年到北京开会，听说金文漪在“文革”初期被遣送回原籍的悲惨遭遇，她后被平反回北京原单位，我立刻去看望了她。看到她虽居陋室，生活清贫，但和爱人郭恒恩爱有加，工作正常，平和度日，我心里略感欣慰，这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相见。

我1976年转业回到广西，后在南宁市自来水公司担任总经理、总工程师。80年代，我到昆明公干，驱车几百公里，专程到锡都个旧看望卞全同学。他向我详细谈了他毕业后不久，因工作关系携带新建水厂设计所需的地形图等有关资料，出差途中去西双版纳游览的路上，被误认为携带机密外逃而银铛入狱。劳动改造期间，又因说林彪的长相像奸臣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加判重刑，直到1980年才获释、平反。好在他当时已恢复了待遇，还是个旧市政协委员和个旧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因此我们之间的倾谈还是轻松愉快的。我还拜访过好些同学，如郑孔秀、朱瑞麟、杨祖良、李正麟、林仰驰、陈庆星、蒋难先等。

1991年我回校参加清华80周年校庆，第一次与部分老同学欢聚。直到2000年给0班毕业40周年之际，给0班同学才第一次回校大聚会，使我尽情享受了同学久别重逢的欢乐。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校工作的井文涌、蒋展鹏、杨志华和在京工作的夏鸿文、杨祖良、唐幸生等同学，是他们的无比热忱和真诚奉献促成了这次难忘的聚会。

我满怀深情地向给0的同学们祝福并共勉：但愿人长久，一路夕阳红！